

「港獨」歪風有所遏止 管治問題仍需解決

鄧 飛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經過特首梁振英親自對在宣誓過程中辱國辱族的「港獨」候任議員梁頌恆、游蕙禎進行司法覆核興訟，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有關條文之後，梁游兩人失去了議員的資格。11月6日晚上，激進「港獨」分子聚眾糾合於西環中聯辦外，高呼「佔領西環」，但也在香港警方嚴陣之下，被驅散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誠然，經過這番從中央到特區政府的連消帶打，激進「港獨」的氣焰一下子被剎住了，這無疑是非常振奮人心的，但是，如果我們從香港管治和發展的全局來看，目前雖然扳回一局，但並未真正能讓人放下心頭大石。一言蔽之，目前香港的管治和發展正在進入一個相持的階段——激進政治難以再進，但同時特區施政難以理順。

整個香港問題，概括起來就是兩大方面：一是管治，二是發展。從管治的方面來說，當然是有效打擊以「港獨」、「自決」為核心內容的激進政治，從而維護國家統一和「一國兩制」的健康發展。筆者認為，在短期之內激進政治應該難以再有什麼新的擴大和突破。

激進政治難以再進

為什麼這樣說呢？激進政治一直面臨一個兩難抉擇：就是這激進到底要激進到什麼程度為止？如果激進的程度一直朝着提升暴力程度的方向發展，那麼終結的激進肯定是所謂的「暴力革命」。從香港的社會民情和治安維護兩個角度來看，這種所謂的「暴力革命」是既不能獲得民心，也肯定會遭受在強大駐軍後盾之下的香港警

方強而有力的打擊。香港警方不是沒有對付「準暴力革命」的經驗的，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平息越南船民營的騷亂，到2000年平息犯人佔據喜靈洲懲教所的騷亂，警方可謂經驗豐富、戰術得當、裝備精良。何況「暴力革命」也不可能得到廣大市民、哪怕是反對派選民的支持，這就是香港的社會民情。

如果「港獨」的激進程度不再提升了，只維持在介乎違法「佔中」和旺角暴動之間的水平，那麼從特區政府處理違法「佔中」和11月6日的衝擊西環的手法來看，顯然執法部門對這種低烈度暴力激進行動已經有非常嫺熟的應對方案。說白了，激進「港獨」派已經玩不出什麼新花樣！所以筆者才得出結論，激進政治難以再進。

立法會絕非法外之地

周轉香 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近日，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接二連三捲入宣誓風波的司法訴訟，游蕙禎、梁頌恆更已被解除立法會議員資格。政府稍後將會舉行補選，恐怕又要耗費數以億元計的公帑。日前，律政司表示會代表特首，入稟法院對劉小麗宣誓的合法性作出司法覆核。除了宣誓問題外，鄭松泰早前於立法會倒轉國旗和區旗，涉嫌觸犯《國旗及國徽條例》，劉國勳議員已去信警務處投訴，要求依法作出跟進；梁國雄公然於會議期間搶走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的文件，特區政府亦已報警。事實表明，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有堅定的決心維護法治，立法會絕非法外之地，違法者必須付

上法律代價。

很多市民認為，過去立法會的秩序實在太過混亂，反對派議員的行徑愈趨粗鄙暴力，對社會造成很壞的榜樣，教壞小朋友，市民十分希望立法會早日撥亂反正。特區政府和建制派對反對派的違法行為，作出入稟和舉報，是站到絕大多數市民的一邊。畢竟，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市民不會接受立法會議員享有違法的特權。若連立法機關的成員也不遵循法律，知法犯法，其他人還會重視法治嗎？法律的權威和尊嚴還有保障嗎？香港人必須明白到，一旦香港失去了法治，最終受害的，

只會是大多數香港市民。

依據西方的破窗理論，倘若我們對社會上的違法行徑視而不見，久而久之，違法風氣會迅速蔓延下去，社會將漸漸失去法治精神。故此，對於立法會議員的違法行為，必須零容忍。筆者完全認同特區政府及建制派以司法手段維護法治的行動！

立法會的權力來源是基本法，立法會議員絕對有憲制責任擁護基本法。作為普通市民，依法守法也是基本的公民責任，立法會議員更無踐踏法律的理由。況且，維護法治只是最基本的責任，若連這一點基本要求也達不到，怎能夠成為公職人員？

香港的智庫發展及「智庫媒體化」趨勢

黃芷淵 鳳凰衛視高級記者

眾所周知，智庫（Think Tank）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透過研究成果，特別是對策建議對政府決策發揮重要影響。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2016年發表的《全球智庫指數報告》，目前全球共有6,846間智庫，排名頭三位的分別是美、中、英三國。在亞洲智庫60強中，中國的18間智庫榜上有名。

香港共有30間智庫，數量在全亞洲排行榜上排第7位，人均比例幾乎為全亞洲最高，但就影響力而論，香港在全球175間最重要的智庫排行卻榜上無名。這折射出香港智庫組織尚未達到能夠影響政府政策制訂的現實。

香港經歷過三波智庫發展浪潮

過去20年，香港主要智庫的出現與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息息相關。香港智庫發展的第一個浪潮是1997年回歸之前。在政權即將移交的大背景下，很多香港市民產生了政治恐慌和焦慮，甚至一度引發移民潮。為應對回歸後有可能出現的政經巨變，多個民間智庫組織應運而生，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和「香港政策研究所」等。

回歸伊始，香港便陷入空前的亞洲金融風暴，進入長達6年的經濟低迷期。2003年SARS肆虐，經濟更跌至谷底，社會經濟都受到重大打擊，香港因此出現第二波智庫潮，例如「新力量網絡」和「Roundtable研究所及其網絡」等。

2010年後，香港青年運動開始普及，從「反高鐵」苦行到「反國教」爭議，2014年香港發生歷史性的「佔中」事件，行政立法關係空前緊張，社會嚴重撕裂，青年問題凸顯。多個智庫先後成立，形成第三波智庫潮。較有影響的有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董建華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前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創辦的「民主思路」，以及幾個月前由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牽頭籌組、附屬於「香港政策研究所」的「香港願景計劃」等。

香港智庫應回歸「思想庫」本質

雖然香港智庫數目不少，但為何有研究成果卻影響不大？有建議卻少為政府採納呢？筆者認為，智庫的本質屬性是「思想庫」，應該通過深入而廣泛的研究，就重大的政經和社會發展等問題提出獨立的看法和對策，其應具有前瞻性，與政府政策保持一定距離，不能被利益集團所綁架，更不能成為政府政策的「解釋者」和「傳聲筒」。香港智庫必須回歸到這一本質上來。

其他原因還有：香港智庫規模普遍不大，



■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需要各類智庫出謀獻策。

資源不多、人才不夠、缺乏國際視野，導致研究範圍過廣、內容過於空泛，欠嚴謹，尤其是智庫普遍存在社團化傾向，導致智庫與「智」脫節，智庫研究的專業性不強，公眾和媒體自然對你的研究成果就興趣不大了，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因此大打折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智庫更是奢望了。

媒體在智庫成果推廣中扮演重要角色

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在智庫研究成果的傳播上發揮重要作用。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一個機構一個產業要達到可持續發展，不僅要守住自身優勢，更要創造新優勢，達到引領性角色。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對於媒體的追求已遠遠超越一則新聞、一個報道、一篇文章。媒體轉型勢在必然。以前發生一件突發事件，我們第一時間會打開電視看新聞，傳統媒體拚的是時間，哪個記者、哪間媒體最快到現場進行直播報道，誰就是贏家。但現在有重要新聞時，觀眾讀者第一時間會打開手機，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自媒體。

以鳳凰衛視為例，董事會主席劉長樂早在十幾年前就洞悉全媒體的必然趨勢，及時以電視為基礎，進而擴展到電台、雜誌，再發展到社交媒體客戶端。台長董嘉耀經常說：

「大事發生時，鳳凰是『八爪魚式』地進行報道。」除電視直播外，還會利用互聯網，透過facebook、微信、微博等進行即時播報互動，務求從多角度全方位接觸觀眾讀者。

鳳凰有一句名言：「我們要影響有影響力的人」。媒體要傳播訊息，實現智慧傳播。而要達到這一點，就離不開另一個關鍵詞：互動。在全媒體時代，轉型中的智庫和媒體正進行着深度的融合與發展。近年，越來越多傳統媒體聘請自己的智庫研究人員，而與

此同時，越來越多智庫組織喜歡招募資深媒體人，因為媒體人走在社會前線，知道公眾需要什麼，從而為智庫提供研究大方向，為政府作決策提出建議。

「智庫媒體化」和「媒體智庫化」大有可為

美國大選前，幾乎大部分主流媒體和智庫研究都預測希拉里勝選，結果特朗普當選令全球譁然，輿論紛紛批評媒體選前的報道，媒體則質疑智庫調研的可信度。要避免出現這樣的落差，引用研討會上一些專家的說法，就是要做到「智庫媒體化，媒體智庫化」。一方面，智庫研究人員要盡量收集到最真實的數據資料；另一方面，媒體也要想辦法了解公眾的心態。

媒體要轉型要發展，需要智庫的智慧；智庫要提升影響力，也需要媒體的宣傳平台。媒體可以進行智慧傳播，但是否能夠傳播智慧，高質素的内容就是關鍵。在轉型成為新媒體全媒體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打造成一種智庫性的媒體，提供和其他媒體不一樣的資訊。因此，傳統媒體必須跳出傳統，報道必須跳出報道，智庫也要跳出固有思維，多與媒體、政黨及其他智庫互動交流，而非只是埋頭研究。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自治特區，並非國家實體，智庫發展先天不足不足為奇。然而，這並不是阻礙其智庫發展的最大困難。香港作為中國和世界「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已經駕輕就熟。隨着社會不斷發展，環球不穩定因素增多，香港更需要各類智庫出謀獻策，為政府提供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建議。假如智庫都能回歸「思想庫」的本質，成為社會「智」慧的「倉庫」，相信一定能克服轉型中的種種挑戰，引領香港把握當下機遇，更好地繼續發展。

管治仍難有大突破

但從發展的方面來說，特區政府依然無法有大的突破。這倒不是因為特區政府正面臨選委會和特首選舉換屆。政府換屆雖然包含一定的不確定因素，但這個短期的不確定因素，會隨着新一屆特區政府上台，迅速走向明朗化。筆者這裡提到的施政難以理順，指的是更具結構性意義的因素。最簡單來說，就是兩個因素：立法行政關係難以理順，樓價租金土地問題難以舒緩。

立法行政關係難以理順，這已經是老大難的問題了，經過9月4日的立法會選舉，建制陣營已經出了吃奶的力氣，雖然仍舊是立法會上的大多數，但非建制陣營的席位不可低估，尤其是「本土派」的入局。但更為根本的問題，不在於立法會中建制與非建制的對立，而在於立法會議員自恃的民意代表性比特首更為廣泛，那麼無論是哪個陣營的議員，都自然而然把爭取選票的終極矛頭指向特首及其施政團隊，都以批駁特區政府施政作為爭取媒體曝光、爭取選民支持的最主要手段。

這樣的話，就算特區政府的施政方案真的得以通過，也費時失事，嚴重落後於經濟社會的發展形勢。一句話，即使對建制派議員來說，政治遊戲規則也是不鼓勵成為支持特區政府施政的執政聯盟式的議員，何況尚有三分之一的反對派議員，以及在他們背後蠢蠢欲動、伺機而起的激進「傘兵」、「鍵盤戰士」之類的所謂社運成員！在不輕易重新啟動政改的前提下，新一任的特首及其施政團隊，如何以擴大民意基礎之外的政治手法和

技巧，哪怕只是稍微改善一下立法行政關係，以達致有效施政，促進經濟民生的發展呢？這是一個非常嚴肅而重要的特首選舉話題。

另外，眾所周知，困擾香港經濟民生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樓價高、租金貴的土地問題。這一屆特區政府為解決土地供應問題傾力作為，但是礙於香港是一個高度外向的小經濟體，特區政府的措施總是難以有效應對外來熱錢的衝擊，樓價不降反升的現象屢屢出現。同時特區的土地開發與環保、原居民訴求等內在矛盾，以及私人發展商高額土地儲備等問題，是新一任特首必須面對並要提出有效解決方案的重大議題。

特首選舉應回歸實際嚴肅的討論

上述兩個方面、三個問題，管治方面是如何進一步遏制激進政治和「港獨」思潮蔓延，發展方面是如何理順立法行政關係，促進有效而及時的施政和發展，以及如何舒緩困擾已久、變成萬難之源的土地問題。筆者忽發奇想，中央不如乾脆對有意參選下一屆特首的人士，開出這份功課表，看看各位有意參選者如何解決這三個問題，而且是開誠佈公，向廣大市民宣講自己的解決方案，接受市民的批評和檢視。這樣一來，未來一屆特首選舉就變成「中央出題、參選者作答、市民檢視」的有趣格局。

「假難民」不斷湧港的情況日趨嚴重，引發很多社會問題。立法會近日就此進行了一番熱烈的討論，不少議員認為，特區政府應積極採取措施打擊「假難民」，務求還香港市民安寧。

現時一些並不具有真實難民身份的人士千方百計來港，甚至有不法分子藉着為他們提供所謂「一條龍服務」來港而牟利。當這些「假難民」抵港後，就濫用「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制」，不但提出免遣返聲請，而且設法拖延審核程序，例如平均匿藏11個月後才提出聲請。有些「假難民」在滯留香港期間從事非法工作，影響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甚至鋌而走險，參與各種犯罪活動，威脅居民的日常生活。

事實上，自2014年3月起計，至今年9月，在入境處完成審核的10,172宗聲請中，獲確立的個案僅65宗，成功率少於1%，仍有待審核的個案則累計達10,815宗，用於審核聲請和為聲請人提供支援的開支，在2015—2016年度達到6億4,400萬元，可見「假難民」及其衍生的問題已變得非常嚴重，對香港的出入境管制、司法制度、治安及福利等環節構成沉重壓力和負擔，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我和經民聯的同事都認為，香港既要注意保障那些確實有需要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士的權利，同時不應容忍一些「假難民」濫用我們的制度，甚至侵犯本港市民的權益。

若要有效解決「假難民」問題，必須對症下藥，採取多項具針對性的措施。

其一，盡快檢討現行機制，堵塞制度漏洞，打擊「假難民」來港，以收立竿見影之效。當務之急，特區政府應全面檢討現行的相關機制和政策措施，並參考海外地區的一些做法，包括審視「統一審核機制」，防止被濫用，包括應取消向身份未獲核實的免遣返聲請人士簽發俗稱「行街紙」的擔保書。同時，應增撥資源，加快審核免遣返聲請的程序，清理現時所積壓的大量聲請個案，並設立收容中心以安置及管理相關人士。此外，應檢視為免遣返聲請人士提供的援助機制，例如設定公費法律援助的上限，以盡快減少「假難民」不斷湧港的誘因。

其二，加強源頭堵截，務求從根本上徹底地解決「假難民」問題對香港造成的困擾。其中一項措施是，加強向「假難民」的幾個主要來源國宣傳，傳達清晰的信息，香港將堵塞制度漏洞，不會容許「統一審核機制」遭到濫用，而免遣返聲請人士在香港也不會獲得工作機會。同時，應加強與鄰近地區合作，尤其是尋求中央政府協助，聯同相關國家嚴厲打擊偷運人蛇集團，堵截非法入境者。

另外，應增撥資源，以舒緩「假難民」問題對香港市民生活的直接影響。當局需要增加入境處、警務處等執法機關的人手，加強巡查非法勞工黑點，打擊從事非法工作的免遣返聲請人士，嚴懲相關僱主，以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機會。同時，對「假難民」較集中的一些地區，應加強警力巡邏，改善區內治安，讓市民可以安居樂業。

設法打擊「假難民」 還香港市民安寧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鄧 飛



盧偉國

「長洲覆核王」浪費公帑教壞後生

游 揚

被反對派捧為「長洲覆核王」的長洲居民郭卓堅，自宣誓事件發生至今，分別再以瑣碎無聊的理由和所謂「國籍」問題，就特首梁振英和多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的誓辭內容，提出司法覆核。他近日接受網媒訪問時，自稱希望「後生仔接班」多提覆核云云。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看穿郭卓堅的司法覆核是無理取鬧。他接連提出惡意官司的目的，不外乎為反對派在宣誓事件中挑戰人大釋法吶喊助威。郭卓堅濫用法援，浪費寶貴法律資源，以司法覆核為樂，為年輕人樹立了極壞榜樣。所謂「長洲覆核王」，不只是濫提覆核的「濫覆王」，更是浪費公帑的「浪費王」。

郭卓堅提出的司法覆核入稟狀聲稱，相關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過去取得英國國籍和港英時代宣誓效忠英女王，抵觸宣誓內容，要求裁定其議員資格無效。然而，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知道，一些人士在回歸前任職主要官員，並無被要求效忠英女王；即使有英國護照，亦無宣誓效忠英國程序。有關覆核明顯缺乏事實根據，常識不堪一擊。而入稟依據所謂的釋法有追溯力，更是故意曲解基本法，誤導公眾。

此外，郭卓堅又在入稟狀提到，梁振英和一些建制派議員在宣誓就任時讀漏或讀錯了一些字詞，甚至是普通話讀音有異，因此他們的宣誓均無效。這類「雞蛋裡挑骨頭」的司法覆核，更顯示郭卓堅咬文嚼字，無聊透頂，為覆核而覆核。

郭卓堅自己亦不打自招，明言提出司法覆核，就是不滿人大釋法。然而，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人大釋法具有無可爭辯的權力。郭卓堅不惜以「小學雞」式和缺乏事實根據的理由提出司法覆核，根本徒勞無功。

郭卓堅絕大部分司法覆核都申請法援，今次繼續這種惡意覆核，濫用司法程序，再次浪費法庭和法援的寶貴資源。這些惡劣行為，本來就不值得提倡。更惡劣的是，郭卓堅還自言希望有「後生仔」接班，傳承其「覆核經驗」，又以「公義」為自己的無理取鬧貼金。如果濫提覆核、亂用公帑的歪風蔓延下去，年輕人有樣學樣，絕非香港之福。社會各界需要警惕一些人士以「公義」之名，行濫用覆核之實，蓄意混淆是非。